进行变法自强。事实上在列强环伺下的中国是根本办不到的，当它们的侵略目的达不到时，总是要诉诸战争的，更何况列强既然把中国当作一块“肥肉”进行争夺，它们也不允许中国强大起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把变法自强同争取民族独立结合起来，既不放弃通过谈判解决中外争端，又要随时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而变法自强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李鸿章的错误教训，对我们今天仍有借鉴意义。今天的中国虽然是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之林，但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真正成为发达国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当前的国际环境，总的来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比较有利的，但也并非风平浪静，更何况某些西方大国并不希望我们真正强大起来，它们不断地搞些小动作来干扰我们的建设。此外，日本又有所谓“新右翼主义”抬头，他们根本不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各国犯下的侵略罪行，这就更需要我们提高警惕。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百年前那种所谓西方对东方的双重挑战，今天也并没有完全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既要坚持维护祖国的尊严和民族的独立，坚决抵制来自西方形形色色的干扰和破坏，另一方面又要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西方一切先进事物，为振兴中华服务，迎来中国的真正复兴。我想，这也是这次战争给予我们的又一点启示吧！

中日甲午战争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且具有极其丰富的历史内容，它给予我们后人的经验教训和启示是多方面的。以上几点粗浅的看法，有不当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此外，我还想说的一点是，总结甲午战争的教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事，也是日本人民的事，甚至是世界人民的事，因为这将成为中日两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新的思想基础，衷心地寄希望于中日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以往事为鉴，绝不能再让过去由于战争所带来的苦难的历史重演。

甲午战争与翁同和的士大夫本色

沈渭滨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作为四民之首的士群，往往是 社会良知的化身，忧国忧民即是他们的本色。晚清以来，尽管士风颓败，士习浮嚣，但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大多数士子仍能以家国为重、与民同忧。其中，一些身居朝廷要职而又恪守“明道救世”儒学原旨的有识之士，更突出地表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他们的言论，主张和作为，在一片妥协声浪中犹如一股涓涓的清流、显出了傲然不群的风骨，做了社会的脊梁。甲午中日战争时期的翁同和、即是这群士大夫的代表人物。

翁同和早年经受过严格的儒学训练。他六岁入塾，受读《四书》、《五经》、《毛诗》等儒学启蒙著作。1841 年 12 岁时，因避战乱迁居苏州，得与父亲翁心存的门生汪鉴斋 同游宋代政治家范仲淹的旧居“端园”，对范仲淹所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颇有心悟。次年又从父亲的讲课中得知瞿式耜、顾炎武的抗清斗争事迹，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铭刻极深。青年时代，除继续研读儒学经典外，又从先秦诸子、历史著作及唐宋八大家中汲取丰厚养料，尤对《周礼》推重备至，以为安邦治国之道尽在于斯。他学问渊博，又知耻躬行、熟悉历代典章制度，主张通经致用，隐然有澄清天下之志。1852 年 23 岁中举，1856 年 27 岁中状

元。金榜题名，成了“天子门生”。1865 年 36 岁即被任命为弘德殿行走，做了同治帝师傅。1876 年 47 岁起又成为光绪帝师。皇恩浩荡，前程似锦，这确使翁同和加深了忠君报国思想，但他的“明道救世”夙志并未被似锦的前程所磨灭，仍时时以一个儒者所追求的“修齐治平”理想要求自己。正是这种士大夫传统的价值观念，赋予了他在甲午战争时期不畏权势、不投时好，力主抗敌御侮，敢于直言论政的勇气和决心。他也在和妥协势力的抗争中超越了单纯的忠君报国局限，成了人类理性和良知的维护者，赢得了后人的崇敬。

面对汹汹而来的入侵者，敢不敢抵抗是检验理性与良知的第一位标准。虽说战争是双方力量对比的较量，盲目言战只能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但是历史早已证明弱者并非不能战胜强者。所以“知情而后能战”只有在敢战之后才显出它的理性价值。即使以当时中日双方的力量比较而言，战前的中国拥有远东第一流的舰队和总数达 80 万左右的陆军，在数量与质量上并未全处劣势；就士气而论，则清官兵中同仇敌忾，杀贼卫国之士亦不乏其人。可见言战者并非徒托空言，主和者难称知己知彼。明乎此，就可知战前围绕朝鲜问题翁同和主张厚集东三省防兵入朝备战之请，其意义已经超越了是否能战的实际，表现出敢于外抗强敌的民族自尊与自信。清流以主战的姿态与主张国际调停者相争，争的就是这一点民族之气，国家之魂。李鸿章等的“以俄制日”，关键不在于与虎谋皮，看不清俄国的虚伪，而在于他一开始就少了这点自尊与自信。所以翁同和希望他“勿盼外援而悚本务”，就是希望这位淮军大帅不要忘了养兵卫国的本职，多一点敢战的决心。这不仅是同僚间的告诫，也是对良知的呼吁。

日本侵朝意在图我，是为有备而战。清军只有抓紧时间布防，才能化无备为有备，遏凶锋而保危局，因此捕捉战机成了力争主动的要着。丰岛海战前，翁同和再三要求朝廷严催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三军速赴平壤，坚守北路，另派北洋舰船巡视牙山海面，遥为呼应牙山守军；丰岛海战后，又坚请增兵平壤，添足四万以与在朝日军总数相埒。这些主张实际上代表着朝廷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心声，决非仅止于清流一派的私见。我们从这一阶段中翁同和致张謇的多通信函中即可窥见其时朝野对此早已私议腾播，而翁本人也每每在私下对当道者无视战机、迁移犹豫的举措多所指摘，既忧且愤。迨至平壤失守，北洋舰队在黄海受损，清军失去了依托朝鲜作为战备缓冲的可能，战机尽操敌手，翁同和在痛心之余便毅然加入了弹劾李鸿章迁移误国的行列，成了主战的清流们实际上的领袖。

私议本是儒家“庶人论政”的传统，弹劾尤其是清流参政的重要手段。就战事而言，清流们包括翁同和在内都不是军事家，但儒生论政，本乎其“道”，而“道之大，原出于天”，所以在儒学系统中，“道”较之现实政治具有更高的层次。儒者的本色就是明乎其道以救世，一旦当政治价值与“道”相违时，就会不计自身得失而作了维护儒学批判精神的卫士了。后世论者，往往把这段晚清士群中的清浊之争归结为单纯的政见之争，其实，在不同政见的论争中隐含着更深层的内容，这就是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还是以天下的是非为是非？清流一派的士大夫可贵之处就是不甘作政治工具而要还士子本色。那末对他们标格清高、以“抱道君子”自励，也就可以理解了。

从弹劾李鸿章开始，翁同和在主战问题上的态度日趋强硬，几乎到了事事相争，义无反顾的程度。即使对朝野震摄的西太后，也敢直言无讳，面折廷争。当西太后要他去天津面告李鸿章设法请俄使喀西尼实践“同保朝鲜”诺言时，翁竟敢称：“臣于此等始未与闻，乞别遣”；西太后要他见李时不必透露太后有求和之意而作为翁自己的意见“从容询之”，他又说：“此节只有李某覆词，臣为传述，不加论断。臣为天子近臣，不敢以和局为举世唾骂也。”事后销差，

他仍对西太后"力言喀事恐不足恃，以后由北洋奏办，臣不与闻"，表现出"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耿介傲骨。

其后，翁同和在起用宿将，厚集兵力，添购军舰，措筹战费等一系列问题上屡有建议。从现存《翁同和日记》中，后人仍可透过谨慎的记载看到这个老儒忧国忧民的一腔热忱和对战局败坏的满纸心酸。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的反割台斗争。他不仅屡次在御前会议上力陈割台的严重后果，而且亲访主持和谈的李鸿章，表达"台湾万无议及之理"。当条约草案传到京师，翁见电文后当场"头晕目眩"，几不能支，"声泪俱下"地哀求朝廷拒割台湾，又向光绪帝泣诉割台势必失去天下人心，并两度造访恭王府企图说服奕䜣出面力争。及至一切努力均告碰壁，条约最后用宝时，他还在军机会议上大声疾呼，反对盖玺批准。孙毓汶以延误和议，万一激成事变，贻误邦国，不知大臣能否担当相诘问，翁同和义正词严指出：强使皇上在这种丧权辱国条约上用宝，你我都将真正成为误国的罪人！言之诤诤，令人起敬。

作为晚清士群中后清流主将的翁同和，在甲午战争中充分表现了中国士大夫忧国忧民的本色和参政论政的传统，却招来了空言误国的恶谥。出现这种事与愿违的结果，固与朝政败坏，妥协势力转嫁责任等政治原因有关，也与清流自身特点相连。它曲折反映出"修齐治平"的传统价值体系已无法适应近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旧式文人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条件下充当政治变革主角的地位已日见脆弱，势将让位于新生一代的知识分子。所以，翁同和的悲剧，也是后清流的共同悲剧。甲午战争后，中国政坛上绵亘不绝的清浊之争已不复存在，而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即将成为政治思想界的重头戏。在这个意义上说，翁同和等清流一派的士大夫们，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可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次绝唱。